

当代英语世界 鲁迅研究

LUXUN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WORLD

乐黛云 主编



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

乐黛云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1 号

书名: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

作者:乐黛云 主编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发行:

经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排版:华东地质学院南昌震旦电排中心

印刷:南昌市文化用品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4.5

字数:360 千

版次:1993 年 12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1.60 元

ISBN7—210—01288—5/Z·99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鲁迅研究在当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本书精选八十年代西方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美)、波德拉(英)、马波李(澳)、伊琳·艾勃(以)及林毓生(美)等人的代表性文章。内容大致分四部分:一、鲁迅的创作;二、鲁迅思想研究;三、鲁迅与中外文学;四、对鲁迅的诠释和接受。反映了以世界文化大汇合为大背景的鲁迅研究的潮流。

作者简介

李欧梵 Leo Oufan Lee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安德生 Marston Anderson

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

波拉德 David E. Pollard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

林毓生 Lin Yü Sheng

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

马波李 Mabel Lee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教授

C·Y·张 C·Y·Chellng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讲师

休特斯 Theodor D. Hentes

美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

霍尔姆 David Holm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杂志主编

伊琳·艾勃 Irene Eber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高级讲师

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

——《当代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序

乐黛云

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以电脑网络、信息传播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多国化”资本主义代替了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经济，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兴起。世界正如马克思所预言，进入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商品化过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这一过程由于信息传播的发达而正在无限地加速和深化。人们越来越难看出自己所从事的细微环节在无比巨大的运转链条中有什么作用和意义，甚至也不再去思考这一问题。日益加速的专业化和商品化将人类知识分裂、切割、物化。生活碎裂成“他人引导”的、非自我决定的碎块，人们失去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感，只有“现在这一瞬”是真实存在。而“现在”本身却是零乱、分裂、多项并存、无中心、无系统的。这就导致长期以来作为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度模式”的破坏。人们只相信目前存在的“现象”、“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各式各样的符号，而对于隐藏于其中，决定这一切的“本质”、“必然性”、“确定性规律”和符号的“固定所指”则深感怀疑或存而不计。这种

曾经被人们所信赖,认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释义框架的解构和碎裂导致西方文化有可能平等对待和容纳其他文化体系并探究和吸收其所长。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无深度、无中心、零散化及其所产生的迷惘和不稳定也促使西方世界一部分人想突破自己原有的文化局限而面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亚、非、拉美文化的重要性被突出出来,世界毕竟不只是欧美;亚、非、拉是组成世界的重要而无法被忽略的重要部分,排除亚、非、拉文化就不能说是世界文化,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文化研究的兴趣逐渐转向第三世界。

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人们一方面为保存原有的文化特点而焦虑,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共产党宣言》)。在这样的处境中,人们发现要使自己的文化得到发展和更新,首先要用一个现代人的意识进行新的选择和诠释,而现代人意识本身就不再是封闭的、固有的民族意识而是容纳了“各民族精神产品”的现代意识。从这种现代意识出发,就要求把一种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以便审视该种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独特之处。我国一位青年学者曾从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流出发,提出一个由“巴洛克时代艺术——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卡夫卡)——中国新文学(以鲁迅的叙事作品和杂文为其顶点)——当代拉美小说(以《百年孤独》为代表)构成的世界性寓言结构”。^①这样的归纳是否准确,先存而不论,其朝向世界文学语境的思考方向则正确无疑。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事实上鲁迅研究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

① 张旭东:《寓言本文中的历史:理解本雅明与重读鲁迅》,见《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9年第2期。

在西方发达世界(英语世界),研究者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参照系来重新认识自己。例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詹明信在他的近作《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①长文中就特别强调:“在本世纪的八十年代里,建立适当的世界文学的旧话题又被重新提出。这是由于我们自己对文化研究的概念的分解而造成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周围的庞大外部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在今天的美国重新建立文化研究需要新的环境里重温歌德很早以前提出的‘世界文学’,任何世界文学的概念都必须特别注重第三世界文学”。他深刻地指出,第三世界文化“在许多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这说明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重新进行估价,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制度里的旧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地工作着的势力的一部分”。

詹明信提出一种理论,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而“这种寓言化过程的最佳例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第一部杰作《狂人日记》”,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和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符号的单一的表述。在寓言中,那种对应物本身处于本文的每一个永恒的存在中而不停地演变和蜕变,使得那种对“能指过程”的一维看法变得复杂起来。例如《狂人日记》重建了一个处于我们的表面世界之下的一个恐怖黑暗的、梦魇般的客观现实世界。“狂人”从他的家庭和邻居的态度和举止中发现了吃人主义,这种吃人主义发生在等级社会的各个层次,从无业游民和

① 译文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张京媛译。

农民，直到最有特权的官僚贵族阶层。这种“吃人”受到中国文化最传统的形式和程序的影响和庇护。人们在绝望之中只有无情地相互吞噬才能生存下去。这种一时看清真相而产生的极端恐怖引起曾经有过类似体验的读者广泛的政治共振。詹明信认为这种恐怖的“寓意”所产生的“震惊”远远超出了较为局部的西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对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和市场竞争的描写。因为鲁迅用“吃人”的寓言来戏剧化地再现了一个社会梦魇的意义，“而一个西方作家却仅仅能从个人执迷、个人创伤的纵深度来描写这种现象”。詹明信认为这种引起广泛共振和震惊的寓言形式“超过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过了现实主义本身”。“吃人”的寓言如此，作为“狂人”另一结局的“遗忘”的寓言亦复如此。“狂人”终于“赴某地候补矣”，亦即重新回到幻觉和遗忘的领域，在特权阶层恢复了自己的席位。阿Q、涓生也都只能在遗忘中求生。

詹明信以第三世界文学的特征——民族寓言作为参照系，反观自省发达世界的文学，指出“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总是产生严重的分裂。而在第三世界这种分裂被共同的民族意识所弥合，“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文学作品可以是政治行动，引起真正的后果。”詹明信说：“作为第一世界的文化知识分子，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意识局限在最狭隘的专业或官僚术语之中……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能正酣睡在鲁迅所说的那间不可摧毁的铁屋里，快要窒息了。”詹明信对鲁迅的解读可能正确，也可能谬误；他以鲁迅作为参照系，对发达世界知识分子和西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同样也可能正确或错误，但是他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试图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来理解鲁迅，并将鲁迅作为“他者”，并从这种与“他者”的对照中重新认识自己，则是八十年代发达世界的一种新的觉悟。

如果说以鲁迅作为一面镜子来反观西方文化的得失还只是一种潮流的开始,那么,把鲁迅创造的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则是西方世界的一种更普遍的共识。

存在与虚无的悖论使全世界知识分子都曾感到矛盾苦恼和困惑:人必须活着,活着就意味着一步步走向死亡。既然每个人的结局都是“复归于空无”,存在的意义又为何物?人生的意义何在?一切可依靠、可信赖,并值得为之献身的,是实存还是虚无?和世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鲁迅终其一生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这一问题寻求着解答。林毓生指出,^①一定要把鲁迅的虚无主义同屠格涅夫和年轻时代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虚无主义认真区分开来。俄国虚无主义者对生活没有任何信仰,感觉不到任何强制和约束,鲁迅虽然也在黑暗的虚无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但却总是受到一种拯救国家,唤醒人民的义务的约束。尽管在《影的告别》中,鲁迅表示了对一切未来美好图景的绝望与怀疑,在《过客》中,他表示憎恶他所曾看到的,所曾经历过的一切,也明明知道前面并没有什么花和草,而只有坟墓,然而,他仍然觉得“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息不下”。在绝望与希望的挣扎中,他始终相信“绝望望为虚妄,与希望同”。林毓生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与鲁迅对待同样感到的“虚无”的态度之不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的新教伦理认为,由于“上帝的绝对超验性”,人是与神隔绝的,不可能成为神。在加尔文教义中,过去曾经如此富于人性的“天父”已经被一种人所不能理解的超验的存在所代替,人只能对一个自己所无法认识的疏离的世界进行着盲目而孤独的苦斗,如果他不能用禁欲式的追求和创造来充实自己,他所得到的只有虚无。中国的“天人合一”理论却认为超验的

① 见本书《关于知识分子鲁迅的思考》。

意义内在于人的生活，“尽心、知性、知天”，人的本质与“天”的本质相契合，人生来就被赋予一种内在的道德与思想能量，具有能够“知天”的判断力。因此，他探求生命意义的努力就永远不是一种疏离的外在的行为。在鲁迅的深层意识中，他总有一种信念，认为生活中总还能找到一些积极与美好的东西，这一点从未动摇过。林毓生认为，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是想创造一点什么，鲁迅则是力求发现一点什么，他们的目的同样都是为了抵御那暗夜中“虚无”的袭来，只是从不同方面接近了同一个问题。

对待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也是世界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弗雷德·詹明信所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分裂，其实，这种分裂在鲁迅也是存在的，但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绝对而是充满着矛盾。鲁迅在1925年5月30日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曾坦白承认自己的思想“含有许多矛盾”，那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消长起伏”。因此忽而爱人，忽而憎人，有时为己，有时为人。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我们在读鲁迅的作品，特别是《野草》时，常常会发现两种视线：一种是从诗人身外往里看，这时，我们会发现痛苦、怀疑和绝望的深渊。另一种是从诗人内心往外看，这时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对身外大众无限的悲悯、责任感和同情，鲁迅正是借此以摆脱内心的绝境。然而，与那个疏离、绝望的个人相对的大众却是一个离弃了孤独者的上帝。在《复仇·其二》中，那个被钉杀的耶稣，感到“遍地都黑暗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李欧梵指出，这种对上帝的最后的绝望曾经使存在主义者基尔凯戈尔恐惧和发抖，而对鲁迅来说却“反讽式地导致了他对自己人性地位的肯定^①。孤独者与大众的对立是鲁迅作品的普遍结构。孤独者注定为大众而献身，同时注

① 见本书《〈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

定了要同大众进行不停息的战斗，直到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不论是战斗还是静止不动，孤独者永远是为迫害他的大众而死。这种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既不是西方式的绝对分裂，也不是詹明信所拟想的简单的统一，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与大众之间的极其复杂、充满着矛盾的关系大大丰富了世界知识分子关于个人和社会关系这一问题的探索。

此外，无论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叙事技巧，两种文化体系的相互接受和影响等很多方面，鲁迅都以他十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和艺术遗产，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这些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视角，深邃的思考，成为探讨这些问题时无法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可以在本书编选的许多文章中看出这种以世界文化汇合为大背景的鲁迅研究的新的潮流。

本书的编译大体分以下四部分：一、鲁迅的创作；二、鲁迅思想研究；三、鲁迅与中外文学；四、对鲁迅的诠释和接受。本书所选文章大部分出自李欧梵教授编选的论文集《鲁迅的遗产》(1985)和他的专著《铁屋之声》(1987)中的部分章节。澳大利亚的两篇选自《澳大利亚东方研究》杂志 1985 年卷和 1986、1987 年合卷。一并在此致谢。

目 录

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序).....	乐黛云(1)
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大众.....	(美)李欧梵(1)
	伍晓明译
鲁迅的小说——现代性技巧	(美)李欧梵(28)
	傅礼军译
鲁迅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	(美)M·安德生(55)
	孔书玉译
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	(美)李欧梵(78)
	陈跃红译
鲁迅的杂文	(英)D·波拉德(114)
	宋佳燕 黄学军译
生命与现实的全方位审视.....	(美)李欧梵(155)
	罗成琰译
《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	(美)李欧梵(182)
	傅礼军译
关于知识分子鲁迅的思考.....	(美)林毓生(212)
	王华之译
从庄子到尼采:论鲁迅的个人主义	(澳)马波·李(236)
	胡军译
鲁迅关于文学与革命的观念的变化.....	(美)李欧梵(258)
	艾晓明译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 (美)李欧梵(283)

艾晓明译

鲁迅和尼采:1927年后的影响和共鸣 …… (澳)C·Y·张(315)

胡军译

胡风与鲁迅的批评遗产…………… (美)西奥多·D·休特斯(334)

程巍译

一个中国高尔基的形成——1936—1949的鲁迅

…………… (美)D·霍尔姆(361)

程巍译

鲁迅与文学保护者的形象…………… (美)葛浩文(391)

孟悦译

欧美对鲁迅的接受——普及与学术研究的动机

…………… (以)伊琳·艾勃(410)

王达敏译

鲁迅的小说

——孤独者与大众

(美)李欧梵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的数月之后，他又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感录”，这篇文章开头便说：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后，不能再见振发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就可以说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个国家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内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不得了；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就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己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

目极多，只需用 mob 的长技，一阵乱躁，便可制胜。……^①

可以把上面的议论，尤其是其中的第二段，看作是对倡导所谓“国粹”的保守人士的具有代表性的激烈指斥。然而，鲁迅的反传统观点似乎超越了“五四”时期的争论，因为它包含了更大的“哲学的”构想：“个人的自大”与“集体的自大”的并置。少数的几个创造新思想的古怪人与大多数乱躁的庸俗的“群众”的并置。这种孤独者与大众相对立的原型结构存在于他的小说艺术的构思基础之中：事实上，这两类人物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虚构的家谱，这个家谱可以提供叙事表层之下的某种“内在内容”。运用这种寓言式解读的方法所获得的种种“蕴意”，并没有证实鲁迅关于他写小说之目的的公开声明；相反，这些蕴意显示了某种不同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更为真实地刻划了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作家的心灵。

这种结构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鲁迅在 1907 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颂扬了一群西方的人物——“精神界之战士”——他们奋力抗拒庸俗，他们的声音是改变历史模式的预言。这些孤独的个人主义者通过反对大众的物质欲望，推动着“文化偏至”（写于同一时期的另一篇长文的题目）的历史的摆锤。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强调这些个人主义者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强调他们的异于习俗的思想的力量。鲁迅的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充溢于这

① 《热风·随感录三十人》，《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311 页。在一篇颇有洞察力的文章中，孙隆基，(Lung-kee Sun)集中讨论了鲁迅关于大众行为的观点，并把这种观点与阿里埃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见他的《被“吃”还是不被“吃”：鲁迅的政治倾向的两难处境》(To Be or Not To Be ‘Eaten’: Lu Xun’s Dilemma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未刊稿)。

两篇文章，使这种关于西方历史的观点具有肯定的意味：他相信这些卓异不群的个人主义者能够让历史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事实上成功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随着鲁迅刚刚萌生的民族主义感情的日益强烈，也许他想在自己的国家里模仿他们。他把拜伦、雪莱、普希金和裴多菲介绍给当时的中国读者群——这里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定义模糊的群体。他试图通过他的作品引入变化（“改造社会”）的思想，向他的国内同胞传达一个孤独的爱国者的思想感情。

在日本从事文学活动遭到惨败后，鲁迅于1918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在这时候，孤独者的形象明显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他的第一篇小说中的“狂人”尽管有一层心理的伪装，但也可以被看作是摩罗诗人的直接后裔——一个叛逆和“精神界之战士”。然而，讲述故事的方式（在前面第三章中曾经加以分析）却使我们怀疑，狂人的识见和意旨能否为大众所理解，而他的见识和意旨本来是意图传达给大众的。因为，我们不会忘记，狂人的洞察力同时也被视为他的“病”的一个决定性的症象。他越是富有洞察力，他在其他人——包括他的家庭成员——的眼里就越显得疯狂，他也就遭到其他人更为粗暴的对待。在日记将近结束时，他实际上已经被家里人禁闭在家里，外部世界也不断压迫他，加重他的幽闭症。因此，狂人的批判意识实际上并没有使他从吃人的大众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种意识只不过加重了他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也吃过人，而且也会为别人所吃。小说的“外在的”含意是思想启蒙的必要性，而这种含意上面被加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必然的结论：一个孤独者越是富有洞察力，他的行动和言谈就越受限制，他也就越不可能改变大众的思想。相反，狂人的启蒙变成了对他自己生存的诅咒，造成了他的悖论式的异化状态——他就被大众所抛弃，而他本来是试图改变大众的思想的。

在日记的序言中，隐含作者宣布说狂人最终被治好了，后来赴